

中药:数千年中华智慧结晶



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，中医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中药，是中国医药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回顾我国中药发展史，中药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起发展成长，为中国人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壹

神农被誉为中国医药始祖

说起中药，肯定少不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。西汉《淮南子》书中说：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，察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，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可用的食物，但中国一向有药食同源的思想，很自然地，在神农尝百草的过程中，一定也会发现百草的药用价值。于是后来的人们直接把这个传说推演为：神农尝百草，始有医药。因而神农又被誉为中国的医药始祖。

除了神农，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，认为伊尹是中药汤剂的发明人。据说商王汤的奴隶厨师伊尹，十分擅长煮汤，他把煮汤的经验用于煎煮药物，从而发明了中药汤剂。与神农不同，伊尹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，甲骨文中多次记载，殷商王室为伊尹祭祀。根据现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，伊尹是夏末商初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

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，根据现代文字学家、史学家们的研究，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“医”字、“药”字，治病主要靠祈求鬼神的巫术。因此在伊尹时代，是否已有成熟的中药汤剂发明，还有待证实。

“药”字最早出现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。西周初期的《周易·无妄卦第二十九》中，有“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无妄之药，不可试也”的告诫。西周时期的《诗经·大雅》中也出现了“不可救药”的诗句。这些史籍材料证明，“药”在当时的人民生活中，已经是常见的元素了。在《周礼》中，则记载了当时的西周王室中，已经有了一个人数达52人的王室医药院。



神农采药图。

贰

战国时期出现最早的医药学著作

1973年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《五十二病方》，这是中国第一部医方书。该书被认为写成于战国时期，记载了治疗52种病症的283个医方，使用了247种药物。医方多是简单的复方，有剂型规定，药物有剂量和炮制要求，是战国时期临床医学的经验总结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药业水平。但是，《五十二病方》中也夹有许多巫术，医、巫并重十分明显。

被认为多半写成于战国时期的《黄帝内经》，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理论经典著作。它是在引入战国朴素唯物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后，对战国医学知识的总结，分为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两部分。《素问》主要总结中医学的生理、病因、病理、诊断及治疗原则。《灵枢》专论用针灸治疗疾病的原理和方法。《黄帝内经》主要讲中医学基础理论，只记载了13个处方，涉及25种药物。

李悝是魏国魏文侯时的国相，率先在各国中变法。他主持制定的《法经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，其中专门制定了有关医



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。

药方面的法律条文。其中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这样的：

凡医生为人配制药物、开药方、施针刺，因违背处方要求或医药技术的基本原则而出错误，致人死亡者，判两年半徒刑。因疏忽而出以上错误，致人死亡者，以故意杀人论处；虽未造成人死亡，也要罚打60棒。就是卖药出现以上错误，致人死亡者，亦按此治罪。

这大约是关于医疗事故最早的法律规定了。

叁

《神农本草经》奠定本草学基础

1972年，甘肃武威旱滩汉墓中，发掘出木质简牍《治百病方》，又称《武威药方》，为东汉早期墓葬品，反映西汉至东汉初期的医药实践。所治之病，涉及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五官科等。全书用药100余种，几乎全是后来的常用药物，比战国时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用药成熟了很多。

药物学体系的初步建立，以《神农本草经》问世为标志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出于多人之手，成于东汉前期或中期，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在总结汉代以前药学经验基础上，创立了中药药性理论和涉及采制、炮制、治则、配伍、组方、制剂、毒性药用量、服药时间的临床药学八原则，为后世本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而临床医学体系的初步建立，则以《伤寒杂病论》问世为标志。该书由医家张仲景于东汉末期写成。

汉代的零售药业，向正规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。最有名的卖药人，是汝南郡（今河南平舆北）的壶翁。

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记载：汝南郡“市中有老翁卖药，悬一壶于肆头”。“壶”即葫芦。“肆”是出售同类商品排成的行列，可见卖药的同业人不少。汝南郡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大郡，药业较为兴旺。这位不知姓名的卖药老翁，将一个装药的葫芦高悬在摊前作为招牌，十分引人注目。后来，“悬壶”成了卖药的标志和行医的代名词。

晋代药业有较大发展。战乱与疾病流行，人们迫切希望得了病以后，能够得到现成的药品即时治疗，于是出现了“成剂药”的专用名称。

南北朝以前，药铺、药摊由医生兼营，医药结合为一体。到南北朝时期，出现了只看病不卖药或只卖药不看病的情况，行医与卖药开始有了分工。

中药三大类商品，药材、饮片、成药，战国秦汉即有出现。但经营规模小，多为医生看病时给药，没有各自的专用名称，彼此之间的界线也不很清晰。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，三者的界线逐渐清晰起来。

肆

中唐时期有了定期药市

唐代国内药材产地扩大，品种增加，外来药物也日益增多，药材市场变得十分复杂，原来的本草书已不适用。唐高宗显庆二年（657年），朝廷命苏敬等23名医官、儒臣“普颁天下，营求药物”，重新编修，取名《新修本草》，简称《唐本草》，载药844种。

各地优质药材增加，使全国市场进一步扩大。药商们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，但也增加了采购的困难。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时间，统一市场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相互交易各地药材，提高经营效益。中唐时期，四川梓州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定期药市。唐末，定期药市传到成都。五代至两宋，成都药市已有较大规模。

长安在盛唐时人口达到100万，是一个国际大都市。城里有东、西两大市场。大小药肆和流动卖药人都集中在两市的药市区，称为“卖药坊”。

唐代在广州生产出一种煎

煮药物的优良用器，名为土锅镬。任过广州司马的刘恂，在他的地理著作《岭表录异》中记载：广州陶家作土锅镬，烧熟以土油之，其洁净超过铁器，尤宜煮药。这种煎药的土锅镬，煮药不干扰药性，价廉物美，很快推广到整个岭南地区。

南宋都城临安，盛时人口已过120万。药业经营分工更细，兴盛超过开封。吴自牧《梦粱录·卷十三铺席》记载，宋理宗淳祐年间（1241年—1252年）有名号的药铺有18家，其中有五间楼前张家生药铺、修义坊三不欺药铺等。

南宋时期，随着经济繁荣人口增长，药店前店后坊的生产方式，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要求。于是临安的民间药商率先于全国开办了“生药饮片”“熟药丸散”作坊，专门从事饮片、成药生产。这是中国最早的民营饮片、成药实业。

伍

明清迎来成药生产大发展

北京明初人口不过数万，嘉靖时（1522年—1566年）已增至百万。各地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，药业兴旺。后又建立了行业组织药行商会，药业成为15个大的行业之一。著名的大药铺，有永乐年间的鹤年堂、万全堂，万历年间的永安堂、王回回膏药铺、马思远药锭。在频繁举行的各种庙会中，也有药商参与交易。在傍晚和黎明前交易的小市，亦有小贩地摊售药。

在中国医学史上，明代李时珍编著的《本草纲目》是一部内容丰富、论述广泛、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。李时珍（1518年—1593年）14岁考中秀才，17岁、20岁和23岁时，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，均未考中。从此之后，他放弃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。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，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、重复或遗漏，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，从34岁起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。经过27年辛勤努力，至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60岁时，终于编著完成《本草纲目》这部巨著。《本草纲目》全书五十二卷，记载药物一千五百余种，附有药图一千余幅，药方一万一千余个，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

大力发展成药生产，是现代药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。生产成药的场地制剂室，当时称为药室。明代人屠隆对此曾有描述：药室的选址要安静，远离生活区，不用时关门上锁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各种设备和制药工具共20种。其中粉碎工具5种：石磨、铁碾、乳钵、研筒、桩臼，适用于不同性质的药材粉碎。大、中、小3种不同孔径的药筛，可以获取不同细度的粉末。煎煮药物使用铜锅，以丸、散剂为主。

清代北京的人口已超过100万，城内药铺、药行林立。著名的药铺，首推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开业的同仁堂，此后有万锦堂、同春堂、玉和堂、仁一堂、包太和、千芝堂、一小堂等陆续开业。它们经营饮片，更重成药开发，使北京成为中国北方成药生产的主要基地。尤其是同仁堂成药闻名全国，在外地也设分店拓展业务。而明代留下来的西鹤年堂，则以汤剂饮片和养生药剂闻名京城。

近代以来，随着西医西药传入中国，中医中药在与之竞争中，也吸收了很多有益的营养，获得了新的更大发展，而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